

## 楚国墓出土猪形漆器品赏



图1

■湖南长沙 杨铁强

漆器工艺在我国历史悠久、成就辉煌,远在几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即有出土的漆器存在,而商代漆器也均有发现。至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漆器工艺更是发展的高峰时期,全国各地皆有出土。据不完全统计,在数以千计的漆器中,有不少是以猪为造型进行制作的,其形态、纹饰都美到极致,且件件堪称国宝。其中湖北荆州出土的两件猪形盒,就是其中的代表。

1986年,位于湖北省荆州市九店乡雨台村的江陵雨台山56号楚墓,出土了一件通高20、长43、宽15厘米的战国时代楚国漆器“彩绘猪形盒”(图1)。雨台山楚墓东面和南面为长湖环绕,西距襄沙公路(207国道)1公里,西南邻近楚故都纪南城东城垣,南距荆州城约10公里。自纪南城建成成为郢都

后,楚人的墓地都在城外。楚人喜好“凿山为陵”,有择高而葬的习俗。因此,上层贵族往往选择离城远、地势较高的八岭山而葬,下层贵族和平民则就近埋葬在地势相对较低的雨台山。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一个大型平民楚墓群。

此“彩绘猪形盒”,由两只身体相连的小猪组成,每一只小猪都微微张口、面露微笑,呆萌可爱且灵气十足。它呈长方状,内空、挖制,以两块整木雕琢而成,两端都雕成猪首。其两个顺风耳朝后,周身用红漆绘成变形云龙纹,下有四足屈膝各朝两端。同时它的盖内侧和底部,还刻画有“\*”图案的符号。此件文物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双头猪形,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兽:“并封”的形象。其形状似猪,前后有头,身体黑色。《山海经·海外西经》有载:“并封在巫咸东,其状如彘,前

后皆有首,黑。”而《礼记·大学》还载:“鸡豕牛羊,民之所畜养以为财利者也。”其喻意,为致富、丰收。这件楚式漆器中的“彩绘猪形盒”习称“猪形酒具盒”(亦称猪形酒具漆器),属于当时饮食生活用器的“诸燕器”。凡与此相似漆器,则皆可视作双头猪的简化。该漆器于朱漆之盒内装有几个耳杯,外表髹有红、黄、灰和棕红漆的装饰图案的间隙中,难能可贵地绘出人物与自然景观;甚至具体之处,到了有狩猎人物、赶车人、牵马人和宴乐人物等场面。从造型可以收纳耳杯的功能和两端可以系绳索的凸出猪形,再加上装饰中人物的活动场景,这正是楚式漆器的典型特征——于功能性和寓意性上的巧妙统一,充分表现楚人与这一“并封”之神亲善与和睦的情感抒发。可以想象,当时的楚人族裔相聚,君子女眷,丽日郊野,筵席而坐,打开“并封”猪形酒具盒,注上琼浆玉酿,配以美食佳肴。时或,“并封”猪形酒具盒,也许还会用以祭祀天地、祖先。



图2



图3

2000年,坐落在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观音档镇天星观村的天星观2号墓,也出土了一件战国中期(大约公元前350—330年)的“猪形酒具盒”(图2),其现藏于荆州市博物馆。整器通长64.2、宽24、高28.6厘米,器盖胎厚1.9、器底胎厚1.1、腹深12.4、内空高10.1厘米,雕琢彩绘都十分精致。此墓由于清代时封土堆上曾修建过一座“天星观”道观,因而得名。其规格较高,有棺有椁,墓葬有多级台阶。虽然数次被盗,但仍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有青铜器、漆木器、竹器、玉器、石器、角器、骨器、银器等各类器物1430件。该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在已发掘的江陵楚墓中是首屈一指的;而大批精美的漆木器,更是光彩夺目。这些色彩鲜艳的出土漆器,不仅为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

该“猪形酒具盒”,呈椭圆形筒状,由两个厚木块分别挖凿成器盖和器身,深腹弧壁圆形成底,扣合成器。外壁再加雕

刻。两端对称,各有一个圆形外凸的猪“拱嘴”形“握手”(图3)。整器为双首连体、对称伏卧的龙。出土时内装三个耳杯(类似于今天的酒杯),故知其为酒具盒。另外,该盒两端首部眼睛圆而外突,角上盘,耳朝后飘于角下。头顶角根内侧,还安有作“捉手”用的铜环。全器内外光洁,内髹红漆;外髹黑漆为地,用红、黄、灰、棕红等色绘花纹。器中部绘四条单首双身龙,龙首下伏于器足两侧腿部上方,四条双身龙对称并列,上下盘绕于器身和器盖的中部。八条龙尾,两两并列蜷曲于四角的内侧。两端龙首的附近,皆绘变形凤鸟纹、卷云纹,四眼的上侧绘环形火焰纹。另在首两端头部的上下两侧、耳、足前方绘一组共八幅小画面的宴乐狩猎图。

## 造型奇特的唐代童子填鸭陶俑

武威市博物馆藏有一对唐代童子填鸭陶俑(原名抱鸟童子陶俑),1997年甘肃武威高坝二队唐墓出土。这种造型的陶俑不仅在该馆的藏品中是唯一的,即使在国内出土的同类陪葬俑中也很少见。这两件藏品大小、样式几乎一模一样,且保存完好,今择选其一介绍如下。

唐代童子填鸭陶俑(见图),造型为童子抱鸭跪坐于束腰圆形台座上,泥质红陶,通高29厘米,童子肩宽12厘米,底座直径14.5厘米。童子右腿跪坐,左腿曲立,怀抱一鸭,左臂环抱鸭颈,右臂抱鸭尾,身体前倾,头紧贴鸭的颈部,迫使鸭保持头部上扬。童子微低首,唇紧闭,紧抱鸭子。鸭嘴大张,作奋力挣扎状。一漏斗形器插在鸭的嘴中。作品通体施白彩和粉红色彩。童子圆脸,发髻中分顺着额头向鬓角两边梳成圆弧状,人物造型丰满;鸭子挣脱束缚的左翅、身上的纹路、大睁的眼睛都表现得栩栩如生,是典型的唐代雕塑。同时出土的还有二十多件唐三彩,有镇墓兽、人物俑、骆驼俑等。

这一对器物表现的是填鸭的场景。填鸭,顾名思义,就是人为给鸭填食促使其快速增肥,鸭嘴中漏斗形器就是方便给鸭填食的填鸭器。

关于填鸭的由来,有资料记载,自明成祖于十五世纪初由南京迁都北京后,北京地区的养鸭事业逐渐发展了起来。原因是当时为了南粮北调,朝廷动员大量民工疏通运河。运河畅通后,南粮源



源不断运往京城,史称“岁漕四百万石”。由于漕运管理欠妥,落入河内的粮米不计其数。北京运河一带的鸭子,长期以这些散落的粮米为食,体型、肉质逐

渐起了变化。正如乾隆年间的才子袁枚所说:“谷味之鸭,其膘肥而色白。”以后,经过北京地区劳动人民的长期精心喂养,优胜劣汰,用人工“填鸭”法,培育出肉质肥嫩、体大皮薄的北京填鸭。用北京填鸭烤出的鸭子,皮层酥脆,肉质肥嫩,颜色鲜艳,味道香美,油多不腻,百尝不厌,成为京师第一特产。至清朝,北京烤鸭已成为常见的佳肴,亲戚朋友之间也常以烤鸭为厚礼相互馈赠。道光年间梁章钜编著的《归田琐记》就有记载:“都城风俗,亲戚寿日,必以烧鸭烧豚相馈赠。”北京地方史籍和文人墨客诗词中对北京填鸭(烤鸭)的记载和赞美屡见不鲜。这个记载说明北京是北京填鸭的发源地,而且至今仍为主要生产基地,但从填鸭的文献记载可知,填鸭技术肯定不是始于明朝,而要更早。

就目前能找到的资料,最早的记载是我国南北朝时著名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这是一本荟萃古今中外农业科学知识的大型工具书,该书记载填鸭叫“填嗉”法,其目的是为了使得鸭子快速增肥。后来的填鸭法应是从此借鉴发展而来。从此记载可知,填鸭的方法很早,最起码南北朝时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人工给鸭子增肥了。

武威古称凉州,是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站,自从汉武帝开河西四郡以来,武威就一直作为战略要地为兵家所重视。汉唐时河西为少数民族所占领,此地水草丰美,是少数民族游牧之地。整个唐

代三百多年间,凉州地区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繁荣。《资治通鉴》中道:“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间里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也有这样的描述:“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唐朝国力强盛,版图广大,凉州因地理位置的重要和经济文化的繁荣而成为我国西部的重要和都会。《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中就有“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的记载。从这件随葬品看,唐时武威不但养鸭而且养鸭已有相当的规模,人们已在探索人工给鸭子催肥,发展鸭经济,从而改变饮食结构,这是社会进步、生活质量提高的体现。从田霏文《怎么填鸭》中的填鸭饲料基本都是北方的农作物也可证明填鸭在北方很流行,这也从侧面为北京填鸭源远流长提供了佐证。

“窥一斑而见全豹”,这一对童子填鸭陶俑可反映出唐时凉州经济繁荣、农业及饲养业生活的丰富多彩。用漏斗形器填食,尤其是流食应该比后来的橡皮管方便好用。武威地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填鸭的优点,并在生活中实践了这种做法。目前尽管没有找到相关文字记载,但随葬品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填鸭没能在武威地区流传下来,或许是后来气候变化,河西不再是水草丰美、宜农宜牧的地方,不再适宜大量养鸭,故而填鸭技术在此地未能普及流传。(高辉)